

近代日本思想史

第一卷

〔日〕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著

马 采 译

内部读物

商务印书馆

近代日本思想史

第一卷

〔日〕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著

馬 采 譯

~~~~~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請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商 务 印 书 館

1965年·北京

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著

近代日本思想史

第一卷

青木書店, 1959

166

內部讀物

近代日本思想史

第一卷

〔日〕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著

馬采譯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北京復興門外翠微路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07號)

京 華 印 書 局 印 裝

統一書號: 2017·143

1965年4月初版

開本 850×1168 1/32

1965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數 130千字

印張 5 14/16

印數 1—3,500冊

定價(9) 0.75元

出版說明

《近代日本思想史》是从日本“幕末”(封建末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这一历史时期的日本思想通史。全書共四卷,正文占三卷;末卷是《年表》,作为全書附录(此卷未譯)。

第一卷从“幕末”到明治专制政权的形成,为近代日本资产阶级思想的創立时期。第二卷从明治二十年代到大正十年代,是日本资产阶级思想进一步发展,并与新兴无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的时期。第三卷从大正十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是日本无产阶级思想发展并和法西斯化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激烈斗争的高潮时期。

本書于1956年初版,譯本是根据1959年第二版譯成的。本書的主編人远山茂树是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山崎正一的政治面目,不甚了解;大井正,原系日共党员,已蜕化为修正主义者;他們的观点在書内必然有所反映。日本近代思想史是值得我們注視并加以研究的課題,本書所提供的史料和观点,我們只能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对于当前我国研究日本近代史和日本思想史的人,此書可权作参考。同时,对于了解当前日本知識界一部分学者的思想、观点,乃至治学方法,本書也可能不无帮助。这就是我們翻譯出版本書的目的所在。

書内脚注都是由中文本譯者、校者或編者所作,一并在在此交代,不另一一說明。

商务印書館編輯部

1964年7月

第一卷目次

原書編者的話	1
第一卷說明	3
第一章 幕末的各种思想	5
一 “徂徠学”的登場	5
二 安藤昌益的“自然眞營道”	10
三 “国学”的本质和局限性	13
四 德川幕藩体制下的“洋学”	18
第二章 日本的启蒙主义	22
一 “启蒙”的概念	22
二 日本启蒙思想的特征	29
三 民选議院論战	33
四 “明六社”和民选議院問題	40
第三章 自由民权思想	62
一 自由民权运动的展开	62
二 自由民权思想的内容	74
三 自由民权思想与先进思想体系的关系	86
四 自由民权思想之近代史的意义	92
五 自由民权运动中的三个代表人物	105
第四章 明治绝对主义的思想	112
一 对于自由民权思想的攻击	112
二 儒佛思想的复活及其变貌	124
绝对主义思想体系和儒佛思想	124
儒学思想的复活及其变貌	128

佛教思想的复活及其变貌	142
三 明治时代的学院哲学	153
欧洲哲学的接受过程	153
学院哲学的形成	160
学院哲学的性格	166
学院派的“哲学家”們	172

原書編者的話

這部《近代日本思想史》(共四卷)是試圖作為近百年來在我國出現的各種思想的通史而編寫的。關於這一時期的我國各種思想，過去多半是由日本民族文學和日本歷史的研究家作了一些闡述，而在哲學領域里，除了少數例外，可以說幾乎沒有人研究這方面的問題。參加本書編寫工作的“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會”的成員，大部分是專門研究哲學的新進。這部書作為近代日本思想史的通史，還是第一部比較認真作品。在現階段，這不能不說是一次大膽的嘗試，而其所以能夠實現，應該完全歸功於從事哲學研究的年輕學者們的熱情。

迫使日本人民付出巨大犧牲的太平洋戰爭和戰後時期的劇烈動蕩，事實上是對於我國近百年來的近代史進行着批判。這種批判，要不是通過日本人的思想本身的改革，就不可能進行得正確。為此，必須撇開日本近代思想迄今為止的形成過程，而從根本上對於思想本身重新加以闡明。把必須摒棄的加以摒棄，應該繼承的繼承下來，這是我們的任務。不錯，我國的近代思想是由於輸入和移植了歐洲思想而形成起來的。但是，通過戰後十年間的體驗，我們確信：我國近代思想的獨創性是在於它植根於人民大眾的生活感情，并把這種生活感情表現為確切的理論，使之成為走向未來康莊大道的一張藍圖。在我國近代思想的形成過程中，我們可以發現許許多多在這個意義上的獨創性。正是這些東西，應該成為我們當前的思想改革的基础。

近代思想在我國的形成過程，也是日本人的生活感情同具有

世界性的近代欧洲思想交鋒对陣的过程。对于这一问题的分析，可能成为从世界史的观点来明确掌握近代思想的开端。对于我国古老的传统思想来说，这也将成为从世界史的角度进行探索的第一步；而这种传统思想，过去由于受到民族自卑感的另一极端——夜郎自大的解释而不止一次地充当了反动的思想工具。

这部书是由“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的成员在一些专家的协助下写成的。附记于此，以表谢忱。

編輯委員

远山茂树

山崎正一

大井 正

1956年7月

第一卷說明

从实际着手編写以来，經過将近一年時間，才完成这本《近代日本思想史》第一卷。花費这么多時間，是否取得了相应的成果，我作为执笔人之一，对此深感不安。

日本近百年来的思想发展过程，对于战败后的我們來說，是一个亟待深刻探討的重要課題。最近十年来，在这个問題的探討上，出現过从各个角度进行的部分嘗試。然而，這個問題不能仅仅停留在部分的探討上，它要求我們进行全面的、广泛的处理。因此，各方面都切盼一部具有連貫性的近代日本思想通史出現，以便作为上述探討的客觀綫索，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我們这些属于比較年輕一代的研究者，所以敢于着手这件可以說是不自量力的工作，无非是因为我們对于这个課題的重要比别人有更加深刻的感受，比别人更加迫切需要一部供我們自己进行探討用的具体資料。我們在工作中，尽管取得了許多先生和前輩的恳切指导和帮助，但是錯誤和缺点仍恐不免。因此，我們决不是一般地表示謙虛，而是衷心期待着讀者給予毫不客气的批評，并且切盼这个試驗性作品能够成为一条跳板，使这个課題的全面研究取得进一步的发展。这部書如能在这个意义上起到一种前驅作用，對我們來說将是喜出望外的。

第一卷，从年代上說，包括幕府末期到明治二十年代前半的一段时期；从內容上說，首先把德川末期的思想动态归納为四个代表性的思潮来写起，接下去分析了明治維新以后，在上述这些思潮的发展变化的基础上，作为性質完全不同的思想体系而移植过来的

欧洲自由主义，分析了它怎样起到尽管不够彻底的启蒙思想作用的经过和它的构成。其次是自由民权思想，它继承了启蒙思想的一切可以吸取的东西，并且通过走向民主主义的方向而克服了启蒙思想的局限性。关于自由民权思想，是从它的内容和构成、它同自由民权运动的联系、它同欧洲思想的关联、它的代表人物等等许多方面进行阐述的。最后介绍了作为自由民权思想的直接对立面，并且通过同它的斗争和胜利而建立起来的明治绝对主义。关于这一思潮，是通过分析它的形成过程和几个重要局面，来阐述它的思想基础的。

在编写上作了如下的分工，第一章和第二章由宫川透执笔，第三章由土方和雄执笔，第四章的一、二、三各节分别由土方和雄、小松茂夫、古田光执笔。各部分的执笔人把初步整理出来的草稿拿到“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的例会上发表，经过会员和作为顾问的诸前辈的讨论和批评，然后写成定稿。

不过，脱稿之后，由于我们自己的水平有限，又采取了问题史的叙述方法，以致许多缺点和挂漏之处都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对于这些，我们准备在听取读者的批评指正之后，分别加深每个人的研究工作，以期纠正。

土方和雄

1956年7月

第一章 幕末的各种思想

一 “徂徠学”^①的登場

在叙述近代日本思想之前，有必要先就这个时期以前的、幕府末期的各种思想进行一番考察。在本章則只限于叙述以下四个思想形态：“徂徠学”、安藤昌益的“自然真营道”以及“国学”和“洋学”。这些思想在元祿、享保期^②以来的德川幕藩体制在政治上、经济上发生动摇和崩溃的过程中，分别起了思想体系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和“绝对主义”^③的近代日本思想有着联系。特别是自从获生徂徠(1666-1728年，寛文6年至享保13年)根据“作为”的人格の立場，批判并扭轉了林罗山の“朱子学”世界観以后，一直到佐久間象山(1811-1864年，文化8年至元治1年)“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思想——这一段幕末思想史的基本动向，一言以蔽之，可以说就是“绝对主义”思想的前奏。

在元祿、享保期以前，也就是说在幕藩体制的成立期乃至稳定期，作为德川封建統治的世界観の支柱，居統治地位の，就是“朱子学”的世界観。它的代表者“朱子学派”の中心人物就是林罗山

① 获生徂徠の学説。

② 元祿时期指1680-1709年近三十年間，是江戸时代封建文化高潮时期。获生徂徠の生年約当于这个时期。享保时期指1716-1733年の十八年間。元祿和享保这两个时期是德川幕府統治の最盛期，同时也是它面临第一次危机の时期。幕府の第一次改革就是在享保年間进行的。

③ 是 absolutism の譯語，由于考虑到日本天皇制不同于一般的专制制度，故仍保留“绝对主义”这一名詞。

(1583-1657年,天正11年至明历3年)。林罗山历仕家康、秀忠、家光三代將軍,參預了創始时期的幕府統治,作为官学思想家居于极重要的地位。德川封建制創始时期的統治者,压制了战国时代^①“下剋上”的风气并且終於在統一天下之后,以貫通在封建武士团上下的主僕关系,和家长中心的家族內部統制关系为核心,建立了封建的階級組織。但是他們并不想把这种階級組織局限于統治階級的封建武士团內部,他們給自己提出的任务是要把这个階級組織推广到被統治階級的“农工商”階級的底层,从而把日本全国放在自己的完全統制之下。因此,他們給了“朱子学派”这些官学思想家們以这样一项任务:建立一种思想体系来从理論上拥护德川封建制的統制和封建的階級組織,并使之正統化。“朱子学派”主张“五伦”道德为貫通人类一切社会結合关系的永恒不变的原理,从而把当时的封建社会的人与人之間的关系和社会秩序加以絕對化,它就是以这个主张来完成这项任务的。具体地說,“五伦”道德,特别是君臣、父子、夫妇的“上下貴賤之义”的永恒性,是以“朱子学”的所謂“理气之說”或“天人相关”的原理为基础的。根据“朱子学”,天地万物都是由“理”和“气”結合而成。“理”被称为“太极”或“誠”,是宇宙最終的根据,是內在于万物的普遍原理,它由于“气”的作用,显现而为万物,取得特殊的具体的形态。“理”內在于人心的时候,便成为本然之性,即先天的本性,同时又作为“五常”,規定着人类根本社会結合关系的“五伦”。这样,“朱子学”的“五伦”道德的永恒性,是从那作为先天本性而內在于人心的宇宙最終普遍原理——“理”中得来的。換句話說,貫通在人类社会一切結合形式之中的“五伦”道德的永恒性,是从自然界的最終原理——

^① 指 1467-1590 年这一时期,即自应仁之乱起到丰臣秀吉統一为止的一段历史时期。

“理”中引申出来的。

“天自在上，地自在下，上下之位既定，則上貴下賤；循此上下而可知自然之理有序。人心亦然。上下不违，貴賤不乱，則人倫正，人倫正则国家治，国家治則王道成，此礼之盛也。”（林罗山：《經典題說》）

如上所述，“朱子学”用“理-太极”的原理，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合而为一，利用自然界的秩序，即天地的空間、上下的关系，來說明人类社会的价值上的上下关系，从理論上把君臣、父子、夫妇的“上下貴賤之义”加以合法化。这样，“朱子学”的世界观对于以將軍家^①为頂点、以农奴阶层为底层的封建的社会秩序，提供了形而上学的基础，从而把幕藩統治当作永恒不变的东西而加以正当化了。“朱子学派”的世界观能够作为官学的思想体系，即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封建道德学”，在稳定期的德川幕藩时代占居統制地位，其理由就在于此。但是，在德川幕藩体制的稳定期，能够作为占居統治地位的世界观，对一切人都有說服力的“朱子学”，到了林罗山死后，由于中江藤树^②的倡导而“阳明学派”抬头，山鹿素行和伊藤仁斋^③創始了“古学”，它就逐渐有了分化的迹象，在它的体系构成上也逐渐发生了变化。这是由于如下的理由。

如前面所考察，“朱子学”的世界观是以“天人相关”“天人合一”这种“自然法則”的原理为基础，从自然界的原理引申出人类社会的现实秩序。其实，依靠自然界的原理来給特定的现实的社会秩序提供基础并加以保証的这种以“自然法則”为出发点的想法，

① 指掌握政权的德川征夷大将军的家族。

② 中江藤树(1608-1648年，庆长13年至庆安元年)是日本阳明学派的創始人，彻底的主觀唯心主义者。

③ 山鹿素行(1622-1685年，元和8年至貞享2年)，伊藤仁斋(1627-1705年，寬永4年至宝永2年)都是“古学派”的始祖。所谓古学派就是反对“朱子学”和“阳明学”，企图研究儒学原典以闡明孔孟学說真意的复古学派。

只有当现实的社会秩序本身非常稳定，以致被認為那就是固定的自然秩序的时候才能够推行。因此，到了社会的现实秩序失掉了稳定性，以致随时可以发生变动的时候，那种給现实秩序提供基础的邏輯——“自然法則”的想法，必然要丧失它的威力。这就是說，用自然法則給社会秩序提供基础，一方面具有稳定社会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要以社会的一定程度的稳定性为前提（丸山眞男，《日本政治思想史》，1952年，第二章第三节“徂徠学中的轉变”）。因此，我們說“朱子学”的世界觀，作为稳定期的德川幕藩体制下居統治地位的世界觀并具有左右人心的說服力，正因为它是在稳定期推行的；相反地，它所以在元祿、享保期以后逐漸丧失了作为統治的世界觀的威力，也正因为幕藩体制进入了动摇和崩潰的过程。这时新兴了“阳明学派”，并出現了“古学派”，这就清楚地証明了这个时代的变动。

德川幕藩体制为了防止崩潰，曾进行过三次大改革。当第一次改革，即“享保改革”（1716年，享保元年），由八代將軍吉宗着手进行的时候，这个幕藩体制早已进入了第一次崩潰过程。“朱子学”自然秩序觀的全面丧失威力，也是大致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正当德川封建制下的社会秩序发生上述变动的时候，作为与此相对应的思想体系，从儒学的另一立場，即从人的“作为”的立場批判了“朱子学”的自然秩序觀，并建立起“古学”的，是荻生徂徠。

荻生徂徠所意图的所謂“儒学”世界觀的轉变，简单說来，不外就是把自然秩序的邏輯轉变为人的“作为”的邏輯。在徂徠看来，“道既不是事物当然之理，也不是天地自然之道，”它不外是“圣人所建立之道”（《徂徠先生答問書》下）。如前所述，“朱子学”的想法，即“自然秩序”之邏輯的特点，是站在直接地把“宇宙的自然”和“人性的自然”等同起来的連續觀上面，而且以前者作为后者的基

础的，而“徂徠学”却否定了人类现实的秩序以“自然秩序”为基础的想法。这就是說，“徂徠学”首先把“阴阳五行”这些儒教哲学的概念，当作“圣人”为了“治国平天下”而行使的“术”，即作为手段来把握；其次提出“夫道乃先王所立，不在天地自然之中”（《辨名》下）的說法，假定了“先王”这个历史的实在，主张“道”即“礼乐刑政”，是由“先王”創造出来的。而且“徂徠学”認為，創造出人的行为规范的，并不只限于“尧舜禹湯”那些古代圣人，还有各时代的許許多多的圣人君子的“作为”。徂徠在这里把八代將軍吉宗假定为当前“作为”的“主体”。这就可以看出“朱子学”認為现实的社会秩序是以“自然法則”为基础的，所以是絕对的，而“徂徠学”則認為这种社会秩序是“先王”“圣人”“君子”等“人”所創造出来的，所以是相对的，从而是可以改变的。“朱子学”主张现实的社会秩序是不可“变革”的，而“徂徠学”則主张它是可以“变革”的。

德川幕府的三大改革：“享保改革”（1716年）、“寬政改革”（1787年）、“天保改革”（1841年），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对于德川幕藩体制实行“变革”的企图。“徂徠学”所以能够成为第一次改革，即“享保的改革”的思想体系，正是因为它具有由“人”来进行“变革”的理論。但这三大“改革”都以“复古”为基調，它的目标不外是阻止商业資本的发展，維持封建的身份等級制秩序。“徂徠学”是在“先王”之“道”中看到了社会秩序真正姿态的所謂“古学”，而且它認為“变革”现实社会秩序的是作为“先王”的后繼者的將軍的“作为”。这就是說，徂徠所期待于吉宗的，就是恢复自然經濟，借此以阻止商业資本的抬头，使封建的再生产过程順利进行。徂徠所說的由上而下的“制度的重建”，就是这个意思。“徂徠学”一方面使封建道德学的罗山朱子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变，从表面上看来，尽管它似乎采取了对于德川封建制进行尖銳批判和促进資本主义

发展的邏輯形态，而实际上則是发挥了新的封建反动思想体系的机能。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是从封建道德学的内部来寻找批判封建道德学的立場，又把德川封建制的“改革”的领导权交给了封建统治者的緣故。“徂徕学”在德川幕藩体制遭到第一次危机的元祿、享保年間建立起来，同时作为思想体系拥护了封建反动的“享保改革”的历史必然性，可以說就在这里。

如上所述，“徂徕学”作为加强德川幕藩体制的反动思想体系，虽然为了“享保改革”服务，但是它却包含着反对根据“自然法則”把社会制度加以绝对化的“人”的“作为”，亦即“变革”的邏輯。这就是說，它承認以封建君主的統治为前提的社会制度的改良和发展。在这里已經有了佐久間象山的“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思想结构，并且为明治绝对主义的“思想官僚”的“由上而下”的启蒙运动做好了准备。总之，“徂徕学”是“由上而下”的，又是采取“复古”形态的改革思想。

二 安藤昌益的“自然眞营道”

如前面所看到的那样，“徂徕学”所提倡的并且由八代將軍吉宗通过“享保改革”所着手进行的幕藩体制的加强工作，从經濟上看來，就是通过恢复自然經濟来阻止商业資本的抬头，从而使封建的再生产过程得到順利进行。由于幕府所采取的，与时代的趋势背道而馳的“复古”政策而加剧的德川封建社会的各种矛盾，必然地，不能不在封建經濟的承担者——农民的生活上集中地表現出来。由于商业資本的抬头和商品經濟的发展，农民被迫站在生活的歧路上；他們負担了比过去加倍的封建貢租。随着封建制的衰頹，由于頻繁发生的飢饉而生活受到严重威胁的农民，在全国各地

举行了絕望的“暴动”。从关东到东北地方盛行的溺嬰，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近年来因《被遺忘了的思想家》(諾曼^①)而知名的安藤昌益(生歿年不詳)从事活动的宝历年間(1751-1763年)，正是这德川封建社会矛盾尖銳化的时期。在东北偏僻农村与农民一道體驗着那袭击农村的德川封建社会的危机和各种矛盾，从彻底的劳动农民的立場，組織并編写那庞大的自然哲学体系——解决矛盾的葯方《自然眞营道》的，正是安藤昌益这个人。

在昌益看来，这种不能容忍的农民的貧穷化，是由于社会上存在着以武士阶级为頂点的“不耕食食之徒”的緣故，这种人自己不去进行流汗的劳动生产，也就是說，不从事“直耕”^②而夺取“众人直耕的产品”。也就是說，这是由于“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孟子》)这个原則，在社会制度上被承認为当然之事的緣故。然而这是不合理的顛倒，不是人类一生下来就这样的。这不外是大家亲自劳动、生产、生活的“自然之世”，不知被什么人，在什么时候，改变为“不耕食食之徒”統治“直耕”的“众人”的“法世”罢了。更明确地說，把“自然之世”改变为“法世”的，正是那些“圣人”。所謂“五伦”的道德，“士农工商”的身份秩序，都是“圣人”創造出来的。因此，“法世”的各种矛盾和不合理，是可以由于复归到“圣人”的“作为”以前的“自然之世”而得到解决。昌益不得不作出这样的推論。而且昌益并不是把复归到“自然之世”这个构思描繪为一种“复古”的姿态，这可从他把“荷兰”設想为模型这一点看得清楚。他的构思是面向将来的，同时也是现实的。

昌益是通过这样一种形式来提出他对于消除和根絕一切剝削

① Norman, E. Herbert, 1909 年出生于日本的加拿大人，日本历史研究家，著有《日本維新史》、《被遺忘了的思想家》等。

② “直耕”，安藤昌益的自造語，即直接参加农业生产的意思。